

## “俄罗斯思想”的文学表达

——论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

□ 耿海英

把“俄罗斯思想”作为民族精神生活主题与民族使命的总和,在别尔嘉耶夫之前,恰达耶夫、霍米亚科夫、基里耶夫斯基、丘特切夫、托尔斯泰,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此都进行过探索与思考。稍晚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视为俄国宗教哲学之父的B.索洛维约夫1888年在巴黎还以“俄罗斯思想”为题作了专门讲演,索洛维约夫认为,民族的思想不是它自己在自己的时代思考的东西,而是上帝关于它永恒的思考。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也是这样一个理路,正如他在《俄罗斯思想》一书开头所讲:“使我感兴趣的问题是上帝关于俄罗斯所作的思考。”<sup>①</sup>

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是通过对俄罗斯的思想运动、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发展来阐释的。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别尔嘉耶夫引用了大量的资料——从中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从“民间宗教信仰本能”到最杰出的思想著述和艺术作品。但对他具有完全绝对性意义的是19世纪的文学:在这里汇聚了俄罗斯精神的所有线索和主要成就。别尔嘉耶夫确信,正是在俄罗斯文学中隐藏着最深的哲学和宗教渴望。他对“俄罗斯思想”的文学表达异常敏锐,不仅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丘特切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清晰地听到了它们,而且在Г.乌斯宾斯基那里,在契诃夫和他的《没有意思的故事》那里找到了宗教—哲学的种子。

<sup>①</sup> Н.А.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2000, p.4.

19世纪俄国文学(及其延续的“白银文学”)的核心思想是关于人的思想;它全部的创作活动,连同它全部的个性趣味和它全部的道德与审美判断的多样性,都是关于这个文学思想的,它有着一种敏锐的关于“人”的直觉。我们只要稍加比较,就可以知道,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丘特切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乌斯宾斯基;契诃夫、高尔基、梅列日科夫斯基、别雷等等之间有着怎样的个性趣味的不同,普希金与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丘特切夫与皮萨列夫等等之间有着怎样的道德与审美判断的多样性。但无论是普希金的奥涅金和阿乐哥,还是托尔斯泰的安娜与安德烈;无论是果戈理的地主们,还是屠格涅夫的贵族们;无论是别林斯基的社会性,还是丘特切夫的审美性;无论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工场”,还是乌斯宾斯基的“村社”;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识分子,还是契诃夫的小市民;无论是奥勃洛莫夫的慵懒,还是无产者的奋进;无论是别、车、杜的社会主义,还是宗教哲学作家们的神秘主义,都是关于人的,关于人的命运,关于人与上帝的关系的。

整整一个世纪的俄国作家经历体验着欧洲的人道主义危机、传统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变形、个人人道主义造成的悲剧;并且在基督教人学这一共同的取向中克服这一危机的渴望使他们彼此或越来越接近,或越来越对立。关于人的问题的最后的和最高的形式是人对上帝的态度问题,是人在上帝和生命世界之间的地位问题,是关于神人与神人的问题。在俄罗斯文学的所有角落都可以感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精神的最伟大的记录”。<sup>①</sup>别尔嘉耶夫正是在俄罗斯文学的所有角落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它所表达的俄罗斯民族思想的各种倾向,然而这各种倾向又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思想的整体。从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一书读来零乱、纷繁、复杂的思想现象中(别尔嘉耶夫的思维类型是直觉的、格言式的,而非逻辑的、条理的),我认为可以建构起一个“多极的俄罗斯精神结构”,并且是具有宗教品质的多极精神结构:斯拉夫主义与西欧主义、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人正论与神正论、人神与神人、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禁欲主义、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共产主义、俄罗斯弥赛亚主义、自由基督教思想、末日论思想、启示录思想……这些思想倾向构成了一个多面立体,各种思想倾向之间错综复杂地相互交叉,

<sup>①</sup>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Париж: YMCA-Press, 1955, p.76.

构成了多而立体的各个棱。多面立体有一个重心——即宗教性，每一种思想倾向都指向这里，都具有一种宗教品质。梅列日科夫斯基曾经指出，无神论也是宗教性的，是“不信上帝”的宗教。别尔嘉耶夫则指出，“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中，宗教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俄罗斯的各种不信教倾向——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和我们的无神论——都具有宗教主题，弥漫着宗教激情。”<sup>①</sup>别尔嘉耶夫更明确地指出：“最杰出的宗教哲学思想不是由专门的神学家，而是由作家，由自由人表述的。”<sup>②</sup>“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喜悦的创造力量的过剩，而是产生于个人和人民命运的痛苦与苦难，产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探索中，这意味着，俄罗斯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宗教性的。”<sup>③</sup>“宗教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俄罗斯作家没有停留在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界限，进行着改变生活的探索。”<sup>④</sup>

《俄罗斯思想》写于1943年<sup>⑤</sup>。这时，作为宗教哲学家的别尔嘉耶夫，是以其业已成熟的宗教哲学思想关照俄罗斯思想运动，从宗教哲学的角度阐释俄罗斯文学的思想价值的。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看到，它极大地拓展了人学的领域。俄罗斯文学的人出现在《旧约》和《新约》的背景之中，人既被表现自己生物的、属自然的一面，也被表现自己崇高的、善的一面。文学既认识人的外表，也认识他的内部。在肉体生命的背后展现了心理生命，而在心理生命的背后又是一个最广阔的领域——“精神的人”的领域。

关于果戈理，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这样写道：“果戈理不仅属于文学史，而且属于俄罗斯宗教史和宗教—社会探索史。他经历了痛苦的宗教悲剧，最终，焚烧了第二部《死魂灵》。”“正如许多俄罗斯人一样，他在地上寻找上帝的国，但他是以一种反常的方式去寻找。”“他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是像先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的讽刺作家，他描绘的不是现实的人们，而是最原始的恶的灵魂。”“他强烈地感受到恶，但他所感受到的恶与社会的恶、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恶完全没有特殊的联系，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恶。”“他的悲剧在于，他从来也没有看到过人并表现人的形象、人身上上帝的形象。这使他痛苦万分。”“关于果戈理，有人说，他看到的是一个死亡的世界。他承认他对人没有爱。”“基督徒作家果戈理

是俄罗斯作家中最少人性的，在最人性的文学中最少人性的。”“他被罪孽感所压迫，几乎是一个中世纪的人。他寻求的首先是拯救。他倾向于公开的忏悔。而有时候他承认他没有信仰。”<sup>①</sup>

别尔嘉耶夫认为果戈理并不是什么现实主义的讽刺作家，而是在以一种反常的方式寻找上帝的国；他描绘最原始的恶的灵魂，他因在人的身上找不到上帝的形象而痛苦万分。他的主人公们都是没有灵魂的活尸。他们没有信仰，就像果戈理“有时候承认他没有信仰”一样。果戈理塑造了在人类历史中经常呈现的一个阶层，他们从《旧约》中坠落，但也没有走向基督教，在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了旧约上帝的感觉和知识，没有对他的态度，没有上帝在旧约夏娃身上体现出的惩罚和宽恕的意志的明确形象，而这种意志创造了生动丰富的个性和文化面貌。果戈理的人已经不是上帝最终创造的人的本性。这是那样一些人——他们焦躁不安地在福音书里的城市和道路上过往，却没有辨认出耶稣；不对他表示出惊讶，不跟随救世主，尽管也不反对他。这是一些来自世界岔路口的人们，在那里王的仆人遇见了他们就喊他们去参加婚宴，但他们却没有穿着婚宴礼服。当王问一来客为什么不穿婚宴礼服时，那人默不作声。“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2.13—14）这是一些没有语言、没有精神、没有面容的人。他们当中没有扫罗，但他们当中无论何时也不会出现保罗，也不会出现约翰。

这个阶层的人包含了果戈理人学的主要内容，而他扮演了他的主人公。他们揭示着19世纪人的处境，俄罗斯文学以各种形式反映了这种处境，即人处在《旧约》与《新约》两个世界的夹缝之中。果戈理的创作是他的“公开的忏悔”。果戈理想穿越这片虚空，穿越这片在人身上不断加深加重的荒凉，从内部、从深层，穿越失去神性的肉体的尘世厚层，穿越历史的浮尘在人身上形成的冲积层。果戈理奔向耶稣，他在自己身上寻找认识基督的和认识人身上的基督的能力，寻找真正的对上帝的认识。在果戈理身上这个过程是悲剧性的。别尔嘉耶夫把黑格尔“不幸的意识”用于他不无道理。

在果戈理的创作里，别尔嘉耶夫发现了俄罗斯文学的宗教道德品质，同时也发现了俄罗斯文学（也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典型的思想——弥赛亚主义。别尔嘉耶夫在论述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时指出：“尽管果戈理的书（指《与友人书简选》——笔者）有不能容忍的毛病，但他有这样一个思想：俄罗斯是具有博爱的

① Н.А.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2000, pp.136, 138.

② Ibid., p.137.

③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Париж: YMCA-Press, 1955, p.77.

④ Н.А.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2000, p.70.

⑤ Л.Ю.Бердяева, Профессия: жена философа. М. 2002, pp.201—203.

① Н.А.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2000, pp.70—71.

民族,寻求地上的上帝的国本身就是俄罗斯式的寻求。从果戈理开始,俄罗斯文学具有了宗教道德品质和文学的弥赛亚主义;除了作为作家的意义外,在这一点上,它具有重大意义。俄罗斯的作家从此以后从渴望创作艺术作品转向创造完善的生活。”<sup>①</sup>

果戈理的创作属于19世纪40年代的创作,此后,无论是无神论的,还是有神论的,无论是60年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70—80年代的乌斯宾斯基的民粹主义,90年代以后的俄罗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还是与此并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托尔斯泰、罗赞诺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别雷等的创作都弥漫着一种特殊的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这一意识是俄罗斯思想的特色之一。

## 二

俄罗斯文学开拓的人学的另一空间是人神与神人。这是“俄罗斯思想”的另一极。

别尔嘉耶夫认为,“人神思想的发现应该归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思想在基里洛夫的形象中表现得尤其尖锐”。<sup>②</sup>人神思想与人道主义思想的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别尔嘉耶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人道主义的形而上的辩证法。”“对待人道主义,他有两种态度。一方面,他理解基于不能容忍世界的苦难而对上帝的反抗。但另一方面,他揭示了人道主义的自我肯定之路,发现了它的极端后果是:人成为崇拜对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当人走向人神,走向自我神化的时候,同情心和人性就转化为残酷性和非人性。”“俄罗斯的无神论就是从同情中诞生的,是从对世界的恶、历史的恶和文化的恶之不能忍受中诞生的。”“但这些学说导致了共产主义革命,而这种革命又以其全部的激情拒绝承认人性。”<sup>③</sup>人道主义的道德产生了断裂,人道主义变成了反人道主义。别尔嘉耶夫在基里洛夫这一形象中,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宗教深度对这一问题的表述。基里洛夫,一个精神高尚的人,极其纯真但又极端脱离实际的人,表述了失去上帝的、自我肯定的人的道路的最终结果。基里洛夫曾说:“谁战胜了痛苦与恐惧,他自己就成为上帝;那时就有新生活,那时就有新人,一切都是新的。”“人将成为上帝,肉体上也将发生变化。”“那个名字叫‘人神’的人将结束世界。”“神人?”——

① Н.А.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2000, pp.71—72.

② Н.А.Бердяев,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Москва, 2004, p.511.

③ Н.А.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2000, pp.76—77.

斯塔夫罗金追问道。“人神”,——基里洛夫回答,——“这是有区别的。”别尔嘉耶夫认为:“人神之路把人引向希加廖夫和宗教大法官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导致否定人,否定有上帝形象的人,否定自由。只有神人类和神人才能肯定人、人的个性和自由。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主义辩证法。”<sup>④</sup>

事实上,俄罗斯思想史上的各种无神论倾向,都反映着一种“人神”思想。它们之活跃与强大,一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一系列强有力的人物一样活跃与强大:地下人、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彼·韦尔霍文斯基、希加廖夫、伊凡·卡拉马佐夫、宗教大法官。他们的身上都骚动着“人神”思想。

而与此相比,俄罗斯思想史上微弱的、几乎听不到的、处于边缘的、主潮之外的声音,“神人”的声音,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佐西马、阿廖沙、基督——安静、弱小、沉默。

别尔嘉耶夫认为,借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正面宗教思想的佐西马和阿廖沙形象尤其在艺术上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伊凡·卡拉马佐夫的形象更强、更有说服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的开始部分就使佐西马隐去不是偶然的。他无法使他出场于整部小说。不过,毕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佐西马身上得以表达了自己的新基督教的特征。佐西马不是传统的长老形象,他已经走过了地下人、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彼·韦尔霍文斯基、希加廖夫、伊凡·卡拉马佐夫等人走过的路。他十分清楚人身上的卡拉马佐夫天性。他已经能够回答人的新的痛苦,这是传统长老形象所不能回答的。佐西马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般的预感的表达,他还没有在自己的艺术上找到完全相应的表达。

佐西马出现在地下人、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维尔西洛夫之后,出现在卡拉马佐夫王国之后。但是,就在卡拉马佐夫王国的深渊之中必定出现新人,诞生新的思想。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加利利的迦拿”一章中描述了这一新思想的诞生。这一章散发着新的约翰的基督教气息。约翰基督教之光在阿廖沙的心灵被阴郁的黑暗所笼罩之时,重新照亮了他。在他经历了死亡和腐臭的无限痛苦之后,耀眼的复活宗教的真理之光在他的眼前照亮。“阿廖沙站在那里,看着,突然直挺挺地扑倒在地上……似乎有某种思想主宰了他的头脑,——而且将会终身地、永生永世地主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人的徘徊之路就这样结束了。人正在回归大地。但对于人来说,在人走过了自我意志与造反之路之后,回归之可能,只有经由基督,经由加利利的迦拿。佐西马说:“就是那些割断与基督

④ Н.А.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2000, p.78.

教的联系、反对基督教的人,实质上,他们自己就是那个基督面容本身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伊凡·卡拉马佐夫身上上帝的形象也没有彻底死亡;他们也可以回到基督那里。经由阿廖沙,他们正回到基督——自己的精神家园那里。

无论是在先前的著作中,还是在《俄罗斯思想》中,别尔嘉耶夫都把佐西马和阿廖沙的形象归于次要的和无力的人物一类。认为他们不成功。他们没有唤起他深刻的宗教哲学思考。他说,佐西马是“新长老生活方式的预言”,而阿廖沙是“新型基督徒的预言”,这是多么无力,多么没有他通常的热情!他没有领会他们闪烁着“神人”的影子。

如果说,在佐西马、阿廖沙身上还是“神人”预感式的表达的话,那么,在“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则更为天才,更为集中地体现出他要表达的“神人”思想,尽管在这里基督形象是隐蔽的。在这里,基督始终是沉默的,他留在暗影之中。正面的宗教思想找不到自己的话语表达。自由的真理非语言所能表达,容易表达的只是强权的思想。自由的真理只在与之对立的大法官的思想中得以揭示;它通过大法官的反驳话语而熠熠闪耀。基督和他的真理的隐性表达使其艺术表现力尤为强烈。大法官论辩,说服。在他的安排中是强有力的逻辑,强有力的意志。但基督的不反驳,他短暂的沉默,比大法官所有的论辩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别尔嘉耶夫指出:“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的人神与神人的对立具有深刻的意义。人应当成为上帝并被奉若神明,但只有通过神人并在神人类中才能实现。”“神人类思想意味着克服人在人道主义中的自我满足,同时肯定人的积极性,肯定人崇高的尊严和人身上的神性。”<sup>①</sup>不过这也意味着人走出生物界线,走出现有的存在性质。俄罗斯思想意识内部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尽管关于世界和人的最终命运这一问题没有通过神学和哲学从理论上给予解决,也没有通过文学找到比“沉默和暗影”中的基督更好的表达。

### 三

与神人思想相联系,俄罗斯意识中有一种牢固的末世论的渴望。“无论从形而上的本性还是从自身在世界中的使命来讲,俄罗斯民族是一个终极的民族。无论在平民阶层,还是在高文化阶层,在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那里……末日论问题占有重要的位置。”<sup>②</sup>因此,思想、道德和美感,在它们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在各

<sup>①</sup> Н.А.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2000, р.151.

<sup>②</sup> Ibid., р.168.

种社会、文化状况下,都被打上了这一烙印。俄罗斯人被自己的智力和想象驱使着超越世界现存的和可能的界线,像要达到世界巅峰一样,俄罗斯人奔向绝对真、绝对善、绝对美,那样地没有理智。趋向绝对和最终,末世论这一渴望不仅弥漫在民间的宗教处世态度之中,也深深浸透到文学之中。它实质上也是文学中的人和创作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末世论倾向表现在渴望走出历史的藩篱,走出已有的文化束缚。走出历史——这是俄罗斯式的朝圣,一个在俄罗斯文学中早已自觉和广泛探索的主题之一。别尔嘉耶夫在其中首先找到了一种文化类型——找到了普希金开创的“永远的俄罗斯大地的流浪者,反抗的忧郁的人”的文化类型。随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流浪者不断涌现。而且他们本身,“俄罗斯文化最有创造性的代表们都是朝圣者,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都是朝圣者”。<sup>①</sup>

无论是书本里的流浪者,还是现实中的朝圣者——文学家、思想家们(文学和生活在他们身上几乎是不可分的)对历史、进步、文化的价值提出质疑,倾向于禁欲主义的放弃世俗生活和虚无主义的破坏。精神朝圣、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这是俄罗斯意识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它不喜欢建立地上的国,而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道路寻找上帝的国,寻找新的耶路撒冷。别尔嘉耶夫用一些最鲜明的例子给予了描述,如他指出了杜勃罗留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的虚无主义的对优秀文化的怀疑态度,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察到的完美文化与完美生活之间的冲突,并渴望达到一种完美的生活。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文学和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暴露性,“他们抨击文明的虚伪的欺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他们揭露高尚的虚伪”,“对虚伪的文明生活的憎恨促使他们到平民生活中寻找真理。因此,平民化,脱下自己虚伪的文化外衣,希望弄清真正的、符合事实的生活实质。在‘自然’中比在‘文化’中有更多的真理,更值得崇拜和赞美。这一点在托尔斯泰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sup>②</sup>。在《俄罗斯思想》中托尔斯泰的形象是一种独特的解释。别尔嘉耶夫在他身上看到了来自东正教的强烈的道德禁欲主义的元素以及它的产物——在对待文明成果和文明本身的原则上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宗教禁欲主义的反抗:反对历史的不公正,反对文化和创造。托尔斯泰也必然成为漂泊者。别尔嘉耶夫把他去世前的离家出走解释为末世论的出走。“他是一个精神朝圣者,在他自己的一生中都一直想成为的样子,他最终也没有成功。但朝圣者渴望终点。他渴望

<sup>①</sup> Н.А.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2000, р.171.

<sup>②</sup> Ibid., pp.113—114.

走出历史,走出文明,到自然的宗教生活中去。这是对终点的渴望,对千年王国的渴望。”托尔斯泰是“属于大地的人,他背负起它全部的重量,同时渴望纯粹精神的宗教”。“就其对于真理、对于生命的意义的追求、对于天国的追求而言,就其忏悔,其反抗历史和文明的虚伪的宗教无政府主义而言,他属于俄罗斯思想。”<sup>①</sup>

#### 四

俄罗斯文学也表达着别尔嘉耶夫本人。

按照心灵和精神气质,别尔嘉耶夫本人也是“最终的而不是中间阶段”的人。在《思想自传》中他写道:“永远使我感兴趣的不是研究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世界的命运和我个人的命运,是事物的终结。我的哲学,按其倾向性来说,不是科学,而是内省的和末世论的。”<sup>②</sup>

别尔嘉耶夫与德国哲学传统有联系,也经历了索洛维约夫深刻的精神影响,但他世界观的主要来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它们强有力地激活了别尔嘉耶夫的思想。

别尔嘉耶夫承认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还是在小孩的时候我就形成了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习性。”<sup>③</sup>而后来,在生活中,在领悟世界中,在思索中,别尔嘉耶夫在很多方面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渗透,并且他也热烈回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这样说,他在悄悄地靠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指引,甚至除了直接的影响,他应该还是有意识地接受影响。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一系列冲突和形象,别尔嘉耶夫最大限度地感受到了生活和文化的危机状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断裂”和“动荡”的环境别尔嘉耶夫早已在自己的家庭中找到了。这个家庭的历史可以构成一个正如在《少年》中的真实情节。他生活的时代触痛了并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旧的贵族圈子的生活方式。世界的不稳定性,事件进程的灾难性,人类存在的问题性——所有这些不仅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读出来,而且被别尔嘉耶夫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所感受。这些都成为了他的精神体验,并且经过充分的准备,他开始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的方式哲学地、艺术地表达这一体验。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地反映的“俄罗斯思想”的悲剧性的一面——斯塔夫罗金的精神的无所归依、无止境的极端的欲望——都曾是(一时的、但不是短暂的)

① Н.А.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2000, p.159.

② Н.А.Бердяев, Самопо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 2004, p.339.

③ Н.А.Бердяев,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Москва, 2004, p.383.

别尔嘉耶夫本人气质的一部分和生活主题。别尔嘉耶夫在自传中坦率地承认道:“斯塔夫罗金曾是我的底片。”他说:“每个人除了正片以外,还有自己的底片。斯塔夫罗金是我的底片。我青年时期经常被人称为‘斯塔夫罗金’,而这儿的诱惑在于我对此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例如,投身革命的贵族颇具魅力,容光焕发的容颜、乌黑油亮的头发、一尊酷似精致的面具的脸庞。)我身上具有一些斯塔夫罗金的性格,但我已经将它们克服了。后来我写过一篇关于斯塔夫罗金的文章,其中反映了我对这一形象的亲密的态度。”<sup>①</sup>他不仅外表像《群魔》里的主人公(他喜欢得不得了),而且内在地趋向他,意识到自己与他有着文化的心理的亲缘关系,在自己身上培育那种生活感受,道德规范,斯塔夫罗金式的精神气质,尤其是1902—1903年在基辅时期,他沉醉于自己当时那种“革命中的贵族”的状态的不可抗拒的魅力之中。

关于别尔嘉耶夫最终可以说,他是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走出来的。对于他来说,“传说”常常遮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面,并且几乎替代了福音书。别尔嘉耶夫在《思想自传》中讲到:“‘传说’中的基督形象走进了我的灵魂,我接受了‘传说’中的基督。基督永远与自由精神相联系,对我来说,终生如此……割断与永恒的精神自由的联系,对我来说,就是割断与基督、与基督教的联系而接受大法官的诱惑。”<sup>②</sup>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得出并在此后确立了自由作为义务、作为伟大的重负的纯粹的俄罗斯思想。“宗教生活中的自由是责任、是义务。人应当担当起自由的重负,没有权力从自己身上卸下它。上帝只拣选自由的人,他只需要自由的人。”<sup>③</sup>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文学中揭示了俄罗斯思想的主要走向,展示了贯穿了俄罗斯意识的19—20世纪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

① Н.А.Бердяев, Самопо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 2004, p.279.

② Ibid., p.427.

③ Н.А.Бердяев. 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а, Москва, 2004, p.254.